

内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如果落到党内资产阶级手里，党要变修，国要变色。一个部门和单位的领导权如果落到党内走资派手里，也同样会出现复辟。甘招公社大道、三家大队的领导权，落到了党内走资派手里，他们就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品分配的方式，使自己成为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者，劳动群众的压迫者，占有他人劳动的剥削者，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两个大队已经或正在实现。

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党内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就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比党外资产阶级厉害得多、危险得多，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从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陈景章、王文青正是这样的代表。他们分别于七二、六九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随心所欲地支配集体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徒具虚名，实际上变成走资派所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陈景章、王文青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的扩大私有制，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陈景章多占自留地六亩四分九厘，平均每口人多占九分三厘，超过政策规定的四倍多，平均每年打粮二——三千斤。七五年就打粮二千八百斤，平均每人四百斤。王文青除以同样手段多占自留地三亩二分外，为了扩大个人养蜂蜜源，在集体树林和撂荒地种植草苜蓿十亩，还把集体一亩一分地簸箕柳据为己有。他们还大搞家庭副业，陈景章七五年养猪六头，宰杀四头，高价出

售，仅此一项就收入五百多元。王文青经营家庭副业品种之广、数量之多更是惊人：养猪，每年五头，母猪每年繁殖猪崽两窝，均投入自由市场，卖高价，可收入八百多元；养蜂，自七一年来每年三、四箱，多时六箱。为了使蜂多采蜜，曾多次用大烟喷蜜蜂；养羊，七三年以来养奶羊一只，用奶喂猪。还养许多兔。这几项总计，每年可获利一千多元。群众说：“王文青家，有哼哼的（猪），有嗡嗡的（蜂），有三半嘴（兔），有四条腿（羊），成了资本主义的饲养场。”

陈景章、王文青还通过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把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拉向资本主义邪路。大道、三家两个大队侵占集体耕地、副业单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自由贸易、大吃大喝、挥霍浪费、阶级敌人翻案复辟等妖风盛行。大道大队有耕地二千三百八十亩，自留地和扩大房场用地就占去二百八十三亩六分，占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三。七三年至七五年私分化肥五千八百六十六斤，高价卖掉化肥九百二十八斤，拉关系走后门送礼四千斤。五年吃喝花掉三千五百六十三元，吃掉粮食一万二千八百三十八斤。这个大队的第三生产队从七三年一月至七四年十月就吃掉干豆腐一千三百斤。七四、七五两年为吃喝送礼宰杀牛八头，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社员气愤地说：“咱队干部真叫棒，不学大寨就会呛，一年到头满嘴油，贫下中农白瞎忙。”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遭到严重挫伤，三家四队有四十多名劳动力，干活的人很少，每年到夏锄季节都得请外队社员、学生支援。各生产队在劳动管理上普遍实行包工，工分带粮，每年秋天庄稼一进场，就开夜饭。为了刺激出工，有的生产队还买点心给社员吃。陈景章、王文青用资本主义方

式管理和支配生产及分配产品。王文青以大队的林业队为吃喝据点，这个队每年养猪种地，打粮二万多斤，全被大队干部换酒、肉、点心吃掉了。社员给编了个顺口溜：“林业队，真够呛，建队八年没有账，公社干部的招待所，大队干部的小伙房，杀猪宰羊家常饭，年年打粮年年光。”资本主义的危害，使集体经济濒临破产，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民生活日趋困难。大道大队几年来公共积累全部刮空，业不抵债。到七五年末，欠国家贷款五万零四十元，欠机耕费一万四千五百元。而全大队仅有固定资产五万零二十元去抵债，还欠一万四千五百多元。这个大队的粮食产量合作化时的一九五六年是五十七万斤，十九年后的一九七五年却减到二十九万二千斤，几乎下降了一半。社员每人年平均收入从一九七〇年的三十九元，下降到一九七五年的十元二角。

集体经济大倒退，社员生活形成两极分化。王文青家九口人，仅有他一个劳动力，除了有四大件、压水井、四间新房，家里尚有存粮二千三百多斤，土布七匹，皮棉三十八斤。群众说：“王文青家一年不分粮，二年不分柴，三年不添衣，生活没问题。”而人口比他少两口、劳力比他多一个的贫农社员杨江仅有三间土平房和一些零散破旧生活用具，七口人扯盖三床破被。两个劳力终年在队里干活，仍欠国家贷款五十元，欠队里四百六十元。大道大队七一年以来就有七户五十四人上了黑龙江。

陈景章、王文青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培植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为其摇旗呐喊。陈景章在七三年亲手把因盗库被判刑五年的蔡文清安插在一队当队长；把因叛变革命开除党籍的杨吉富提拔为二队副

队长。这两个人为陈走资本主义道路出谋划策，狼狈为奸。王文青把所谓“不是自己人”的大队副书记赵庆文和大队会计杨文焕撤掉，把自己的心腹孙凤瑞等人拉入大队班子。生产队副队长车会芹经常给王文青送礼，传送情报，他就把这个有男女作风问题，大搞投机倒把的人拉入党内。王文青搞资产阶级这一套很不得人心，群众多次给县里写信告他。他对这些群众怀恨在心，找各种借口打击报复，甚至私自非法搜查了给他写上告信的社员家，私看上告信底稿。对写信上告他的社员车成才，要罚工分，并唆使公社一个干部多次到车家威胁恫吓，令其陪礼道歉。并把县里转给公社党委的上告匿名信拿到群众中认笔体，以便打击报复。七〇年春，贫农社员李忠诚向一个五七战士反映过陈景章的问题，陈知道后，先把李找到大队进行威胁恐吓，继后又闯入李家，破口大骂，扬言要法办李忠诚，要把李全家撵出大道大队。七四年秋，群众往县里写信上告他，陈得知后，怀疑是社员杨振声、陈作荣搞的。打了杨振声，骂了陈作荣，致使陈作荣气愤成疾，作下肝气郁结症，至今不能干重活。走资派对贫下中农狠，必然对阶级敌人亲，富农分子张广兴欺邻占地，把下中农杨继学房后地占去一丈多，并把杨当院的杖子拔掉，还扯着杨继学上大队找陈景章告状，陈景章站在富农分子一边，指责杨继学“不团结大多数”。使杨有理没处讲，被逼无奈，于七四年秋把家迁往黑龙江。原东升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永学任职十一年没批过一个阶级敌人，却吊打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十四人。可见，走资派爱谁恨谁，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真是泾渭分明！陈景章、王文青生活也是十分糜烂的。陈景章与两名妇女乱搞两性关系，王文青先后与四名妇女乱搞两性关系。

陈景章、王文青等人，把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上去，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瓦解社会主义经济

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的命根子，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和存在的重要经济基础。陈景章、王文青就是抓住了资产阶级法权这根救命绳不放，以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极力强化和扩大，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利用职权搞特权，成了贫下中农的吸血鬼。

陈景章全家七口人，就他一个劳动力，任大队书记三年就成了暴发户。他利用分配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对贫下中农进行残酷剥削。陈景章仅一九七五年通过“贪、占、吃、花、补”五个渠道捞取九百八十二元。相当于陈所在的第三生产队上等劳动力三十五人的全年收入。他七三至七五年共贪占二千零七十四元，贪占粮食六百三十斤。这么高的剥削率，比老牌地主阶级还要厉害得多。几年时间，他就成了“‘野马’（指表）不离手，做衣不用手（指缝纫机），烟酒糖茶不离口，上集赶店不用走（指自行车）”的暴发户。王文青的生活水平也是青云直上。现有进口手表，飞鸽自行车，巨龙缝纫机，半导体收音机，“三五”坐钟，应有尽有。

但是，走资派利欲熏心，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没有止境。陈景章在侵吞大量集体财物的基础上，大兴土木，营建安乐窝。他原有住房三间，七五年初又新建四间住宅一处。他精心设计，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房屋，地基半米，水泥灌浆到顶，四梁八柱，水磨石窗台、

锅台，防尘炉灶，白灰粉壁，水泥屋地，陶瓷管烟道，明窗暗门，椽子之间用木闸板密封。同时还在门前打水井一眼，可以压水吃，可以用水泵抽水浇自留地，还可做冷藏库。为了修造这个安乐窝，他侵占国家支农物资水泥二吨半，木材四方半，还有钢管、角钢、油毡纸等十余种，还动用生产队农田基本建设的石头四十八车。群众说：“陈景章，有神通，四防屋（防震、防水、防雀、防鼠），三用井，国家钱，集体工。”王文青本来也有三间房，于七五年春以同样手段骗取国拨红松六方，水泥四吨半，贪占集体石头一百方，砖六百块，又盖了四间“石头到顶，水泥挂面，红松柁檩，红砖铺地”的新房，质量比陈景章的还好。陈景章为了保命，无病求医，极力寻求高级营养药，服用“龟龄剂”、“参茸丸”等多种贵重药。

拉关系，走后门，蚕蚀集体经济。陈景章大慷集体之慨，几年来，为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耗费集体谷子、大豆、江豆、花生等二千六百三十三斤，化肥四千斤，树枝子二十余车。在公开送礼的同时，还巧立名目，报销办电招待“维人费”等，仅七五年光招待费就花去一千零七十一元，吃掉粮食三千七百三十六斤，陈景章就是利用这些手腕同县、社二十三个单位，三十四人拉上关系，非法搞到水泥十九吨，木材九立方米，手表六块，棉籽饼二千斤，以及自行车等物资。贫下中农说，陈景章把集体东西往城里送，把城里东西往自个家弄，他家越来越肥，集体越来越瘦。这样一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变成了走资派所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成了一个外壳。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通过对陈景章、王文青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的剖析，我们看出，这两个党内走资派，和老牌地主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级。

(二)

甘招公社资本主义泛滥，出现走资派，固然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激烈斗争的反映，但和公社党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有直接关系的。

一、不抓阶级斗争，放纵新老资产阶级

能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和资产阶级在哪里的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关键问题。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叫嚣“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农业学大寨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干”，借以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甘招公社党委在这方面中毒很深，错误地把发展生产看成是农村的主要矛盾，说什么“说一千道一万，粮食上去事好办”，“过硬不过硬，单看秋后一过秤”。认为甘招自然条件差，要改变后进面貌必须从生产入手，“靠生产救甘招”。因此，几年来，只抓生产力不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心里想的，下去问的，本上记的全是生产方面的事。为了搞好生产把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又拣了回来。在社办工业上，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不管方向对不对，啥挣钱就搞啥，为了使工人多生产，用给“加班费”、“高补助”的办法进行

“刺激”。在农业上，七五年省哈尔套会议后，还搞工分带粮，包垅到人，干的好的奖工分，不出工的罚工分，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思想。群众说他们是“嘴讲纲，眼盯目，手抓粮钱物，越干越糊涂。”至于党委自身和基层班子中的严重问题，却视而不见，见而不管，听之任之。党委内部从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主张“友谊第一，原则第二”，保持一团和气。甚至有的领导已被糖衣炮弹打中，充当了阶级敌人的保护伞，也不斗争，说什么“谁走邪道谁沾包，谁吃咸盐谁咳嗽”。搞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致使歪风邪气上涨，从七一年以来，有五名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蜕化变质，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中四人被逮捕法办。对大道、三家等基层班子的问题，公社党委主要领导受了贿不想去解决，一般委员怕沾包不敢去解决。几年来，群众一再写上告信检举揭发，他们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群众揭发陈景章、王文青通过非法手段，大量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修建“安乐窝”，而党委却认为，人家“能干”，家庭副业搞的好，“治家有方”。群众揭发张永学等打骂贫下中农，党委却认为他们“压茬”，“是好干部”。群众揭发老资产阶级杨世尧在社办工厂享受特殊待遇，剥削工人，党委却认为“他有技术，应该照顾。”由于公社党委的偏袒放纵，使走资派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去冬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广大群众同新老资产阶级展开激烈的斗争，公社党委有些同志惴惴不安，公开抵制。甚至要把王文青搞成“那顺式”的典型；县委让公社党委出一名同志配合工作队把陈景章的问题搞清楚，公社党委以人少为借口拒不参加；工作队说，陈景章是走资派，公社党委认为，这是伤害了好干部；县

委决定陈景章停职反省，检查交待问题，公社党委迟迟不表态；县委决定利用陈景章这个反面教员组织全县社、队干部去大道大队现场参观受教育，公社党委公开提出不参加。尤为严重的是，公社党委乘春节工作队休假之机，召开全社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以检查为由让陈景章公开亮相，公社党委称赞检查的深刻，态度好，并说：“王文青是犯了错误的好干部，书记职务不变，陈景章虽问题较重，但已认识，还可当副书记”，公开为资产阶级撑腰打气。群众气愤地说：“公社党委这么一弄啊，胡汉三又回来了！”

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新老资产阶级输血供氧

甘招公社党委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公社内部一些重大问题，只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在社办企业上，搞专家治厂，把工人当成雇佣的奴隶，实行“管、卡、压、罚”。在农业上，不相信群众，有些书记、队长说了算，有的看谁不顺眼，轻则破口大骂，重则举手就打。在物质享受上，他们以权谋私，互相利用，大量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七三年至七五年，公社和社直单位干部私分化肥六吨多，七四年用种子从山东换回四千多斤小麦，也被公社和大队干部分掉。公社书记×××几年来，从公社和生产队弄化肥、小麦、木材、羊毛等，还叫综合厂工人给他家砸管井、打箱子柜。公社副书记×××任职二年半，先后从七个大队十几个生产队弄粮食三百八十斤，花生一百八十斤，苹果上千斤，树枝子三车，柴油二百六十斤，等等。群众说：“×书记上至苹果梨，下至荞麦皮，上至肉蛋，下至葱蒜，什么都划拉。”陈景章、杨世尧等新老资产阶级看透了公社领

导爱贪占的心理，为了找靠山，便投其所好，送礼行贿。党委书记看见陈景章新买的英格表很羡慕，陈景章心领神会立即撸下来换给了他。党委副书记×××家缺啥，陈景章就给弄啥，什么谷子、粘米、花生、江豆、大豆、粉条、猪肉都主动送上门来。这位副书记说自行车很难买到，陈景章便走后门给买一台永久牌的。这两位公社书记都多次在陈家吃喝过。他们之间的关系达到很要好的程度。七五年省哈尔套会议后，对陈景章、王文青扩大自留地仍不进行限制，那位×副书记还背着党委给他们二人批了新的房基地，陈占房场一亩五分四，王占房场一亩一分。党委书记知道后，点头默许，使他们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化。陈景章本来是经济上的暴发户，可是公社党委七四、七五两年还批给他医药补助费五百零一元，加上从大队拿的补助七十元，平均每月二十三元七角多。陈景章的一年医药补助费相当于他所在大队十个上等劳动力一年的收入。杨世尧要建房，党委几名领导亲自陪他选房基地，架设专线，花一百七十元，叫公社加工厂报销。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甘招公社党委有些领导人，不仅代表了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他们本身的所做所为也属于“走资派还在走”行为。

三、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组织路线，成了新老资产阶级的保护伞

在按照什么标准选拔干部建设班子的问题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存在着激烈的斗争。邓小平为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叫嚷建立一个“敢字当头的”、“坚强有

力的”领导班子，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甘招公社党委认为“压茬的、敢干的、叫齐套的”就是好干部，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看干部。甘招大队七队邓广成当八年生产队长，打了二十六名贫下中农，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公社党委却认为他“虎实”、“能干”，七四年发展为党员。孙风杰是混入党内的坏家伙，一贯对现实不满，多次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七四年还种大烟，群众叫他坏种（已扑）。那位公社副书记却认为他“有两下子，能叫齐套”，要提生产队副队长。杨世尧，一九五五年前，在沈阳私营“和平汽车修配厂”任经理，因施放“五毒”，高利盘剥，违法乱纪犯罪，被判刑三年，刑满就业，一九六九年到农村插队以来表现不好。可是公社党委却认为他“有技术，能赚钱”，便不顾群众的反对，把他任为公社“农机汽车修配厂”的副主任，他一上台，立刻把社办企业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唯利是图，故伎重演，随意处罚解雇工人，把劳动力变为商品。

由于甘招公社党委几年来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没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致使社队班子混乱，阶级敌人捣乱，资本主义泛滥，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不起来。粮食产量从七三年的七百七十五万斤到七五年的六百一十七万斤，下降百分之三十八；吃国家返销粮由七四年的四万斤，增加到七五年的二十三万斤，增加四点七倍；社员每人平均收入二十五元，集体欠国家贷款五十万元，是全县最多的一个公社；社员欠信用社贷款十三万元，社员欠生产队二十多万元。有的大队和生产队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已经成了空壳。

(三)

毛主席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甘招公社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几年来所犯的严重路线错误，从反面证明，他们并没有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从他们的问题中，得到几点启示。

一、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个体农民虽然走上了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仍然保留着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特点。“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陈景章、王文青等人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出身于中农、下中农，带着小生产者所固有的习惯和心里入了党，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当上干部，掌握了一定的领导权以后，把追求发家致富的欲望，变成以权谋私发家致富的行动。他们入党十年分别当大队书记四年、七年，就变为党内资产阶级，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从组织上看，对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没有进行严肃的斗争；公社党委个别领导人，自己思想上就存在较浓厚的小生产者的私欲，而且从他们那里得到某些好处。因而，对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然就视而不见，甚至推波助澜，成为他们的保护人。

毛主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坚持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彻底改造小生产，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

内容，也是我们全党长期的战斗任务。这个任务比起剥夺剥削者来要艰巨得多。对小生产不能剥夺，只能教育、改造，只能通过长期的、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来完成。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完成这个任务，各级领导班子、党员干部，必须首先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小生产思想，改造世界观，这样才能勇于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做斗争，并战而胜之。

二、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走资派产生和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走资派总是力图通过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来培植复辟势力，所以“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陈景章等人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利用窃据的权力，以权谋私，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对贫下中农进行残酷剥削，很快成了暴发户。陈景章以集体财物为资本，到处拉关系，请客送礼，手伸的很长，他可以往国营企业里安排工人。所以群众说：“陈景章不仅是大道大队的书记，也是农机厂、医院的书记。”所以如此，他们依靠的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是陈景章、王文青等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复辟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资产阶级法权就属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内容。无产阶级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不断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为资产阶级的最后消灭和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创造条件。甘招公社的调查实践，使我们加深了对毛主席提出的对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光辉思想的理解。事实告诉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扩大，实质是搞马克思

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大问题。一切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应该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三、党内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最危险的敌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现在党内。党内走资派成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成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所以，搞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看到老的资产阶级，尤其应当注意识别党内的资产阶级。如果我们不取得对陈景章、王文青这些党内走资派斗争的胜利，就不能取得同社会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斗争的胜利。只有坚持同党内走资派斗争，才算抓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清醒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甘招公社党委在整风中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从陈景章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中所应汲取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识别走资派首先要看他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党内走资派在政治上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经济上代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人政治上反动，经济上贪婪。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陈景章大搞资产阶级专政，在一个大队范围内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和最危险敌人的凶恶面目。

四、加强学习，深入批邓，坚持同走资派作长期斗争。首先应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要弄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

党内”的英明论断。甘招公社党委之所以对党内资产阶级失去警觉，主要原因就是不学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总是玩弄阴谋诡计，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要及时识别他们，就需要借助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所以，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特别要学习好毛主席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还要加强向群众学习。陈景章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在广大群众中是不得人心的。他们有的写上告信检举揭发，有的同他们做面对面的斗争。而甘招公社党委的某些领导人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相信自己超过相信群众。群众意见符合自己想法的就听得进，不合乎自己想法的就听不进。因而，群众对走资派的斗争他们不仅不支持，反而进行指责，把自己置于群众的对立面，成为走资派的保护人。

毛主席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陈景章、王文青和贫下中农，完全是这样的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甘招公社党委个别领导人同贫下中农的关系也在朝这方面转化。他们在县委工作队的帮助下，通过整风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总结了经验教训，增强了读马列和毛主席书的迫切感，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当前，甘招公社革命和生产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形势很好。

（摘自朝阳地区、喀左县革委会调查组的调查报告）

发至：各县组织组，公社党委，地直各单位，地区机关组（委）局，地、县委常委。

报送：省组织组，《支部生活》。

（共印1000份）

组 织 工 作

（第3期）

朝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组织组编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喀左县大道大队党员、群众用同 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一年大变样的事实， 赞颂毛主席革命路线

喀左县甘招公社大道大队的党员和贫下中农，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眼含热泪回顾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一年大变样的事实，更增强了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和崇敬的感情。他们决心把无限的悲痛化为巨大的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坚持同党内走资派做斗争，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大道大队共三个生产队，一百五十五户，七百四十六口人，二千三百八十亩山坡地。过去是全县有名的后进队。人们说：“全县看甘招，甘招看大道”，说的是这里土地瘠薄，条件不好，搞不上

组 织 工 作

(第 2 期)

朝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组织部编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

——甘招公社的调查

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重要指示，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对喀左县甘招公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现实作了调查，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加深了对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的理解：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

(一)

列宁指出：“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这个旧制度的政治代表，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是党